

哲學叢書 50

橘枳之辨

中國哲學的名典實

許朝陽 著

橘枳之辨

中國哲學的名典實

許朝陽 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橘枳之辨：中國哲學的名與實 / 許朝陽作. --

初版. -- 臺北市：洪葉文化，2008. 06

面；公分

ISBN 978-986-6828-25-6（平裝）

1. 中國哲學

120

97010527

橘枳之辨——中國哲學的名與實

作 者／許朝陽

責任編輯／陳志源

封面設計／張淑慧

發行人／洪有道

發行所／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登記號：局版北市業字第1447號

地 址：106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14弄22號3樓

電 話：02-2363-2866

傳 真：02-2363-2274

劃 撥：1630104-7 洪有道帳戶

e-mail:service@hungyeh.com.tw

http://www.hungyeh.com.tw

版 次／2008年06月 初版一刷

I S B N／978-986-6828-25-6

定價◎360 元 [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]

◀ 版 權 所 有 · 翻 印 必 究 ▶



高一志 (Alfonso Vagnone, 約 1566-1640) 的《斐錄答彙》(1636)。「斐錄」即為「斐錄所費亞」(Philosophia)之簡稱。《斐錄答彙》上下卷共分十二類，全屬自然科學；作為科學前身，代表著希臘以來的哲學觀。圖為收於《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》第 12 冊的版本，台北：台北利氏學社，2002。

西學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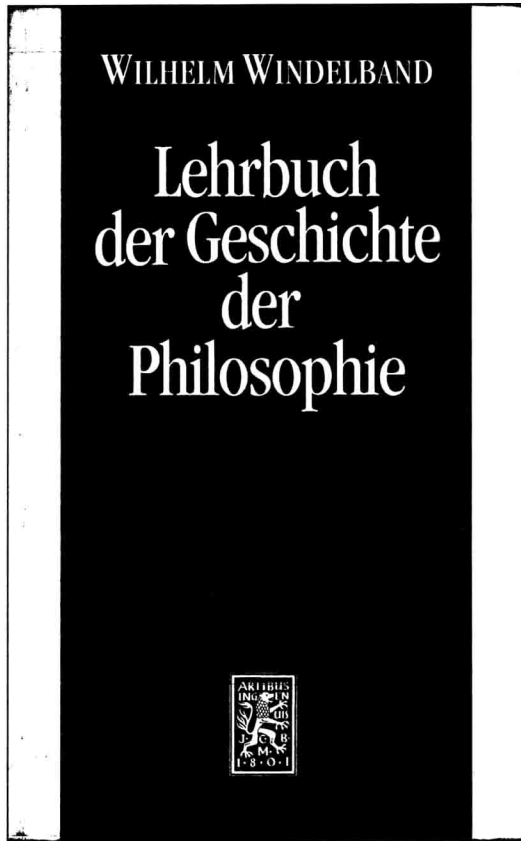
西海耶穌會士艾儒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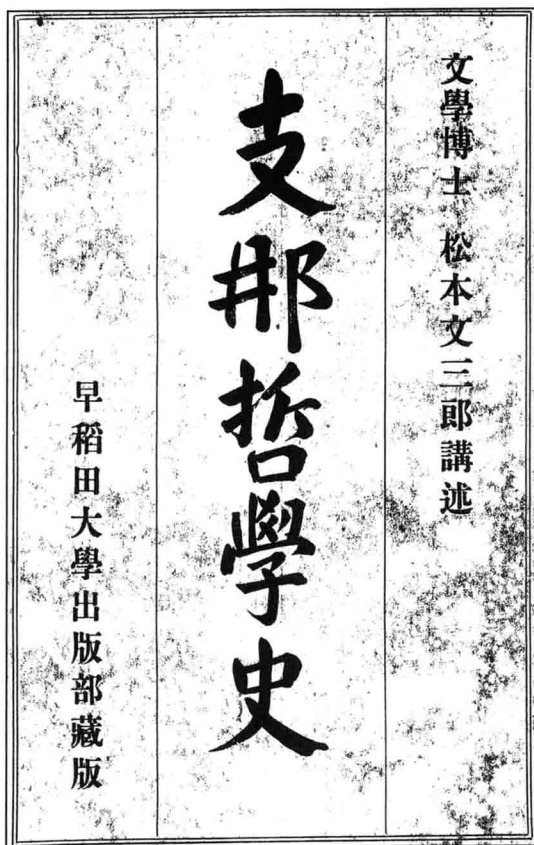
極西諸國總名歐邏巴者，隔於中華九萬里，文字
語言經傳書集，自有本國聖賢所紀，其科目考
取雖國各有法，小異大同，要之盡於六科。一爲
文科，謂之勒鐸理加。一謂理科，謂之斐錄所費
亞。一爲醫科，謂之默第濟納。一爲法科，謂之勒
義斯。一爲教科，謂之加諾捫斯。一爲道科，謂之
陡祿日亞。惟武不另設科，小者取之材官智勇。

97

艾儒略 (Julius Aleni, 1582-1648) 的《西學凡》。《西學凡》所介紹的歐洲知識體系分為文科 (Rethorica)、法科 (Leges)、醫科 (Medicina)、理科 (Philosophia)、道科 (Theologia)、教科 (Canones) 等六科，其中理科即是「斐祿所費亞」(Philosophia)，底下分落日加 (Logica)、費西加 (Physica)、默達費西加 (Metaphysica)、馬得馬第加 (Mathematica)、厄第加 (Ethica) 等五家。圖為收於李之藻輯刻《天學初函》中的版本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65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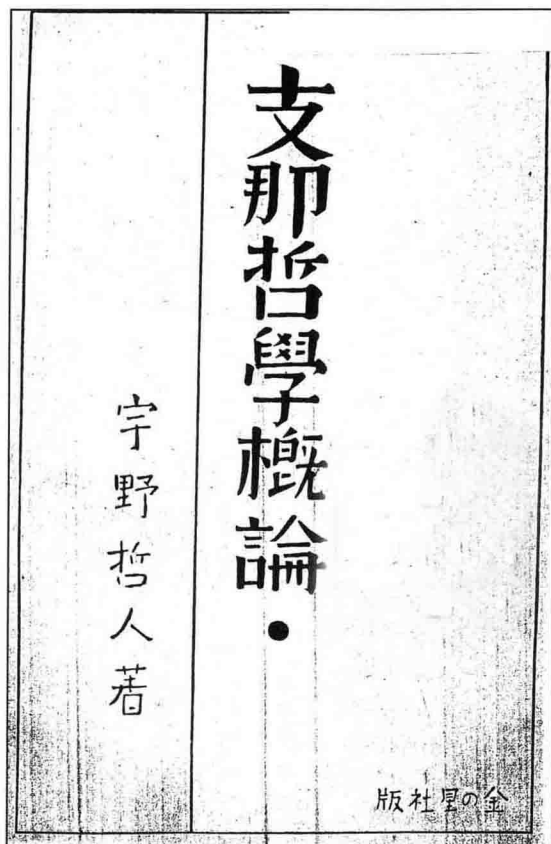
文德爾班 (Wilhelm Windelband, 1848-1915) 於 1892 年出版的《哲學史教程》，原為德文本，後於 1893 年由詹姆斯·H·塔夫茨 (James H. Tufts) 譯成英文，中文則有羅達仁的譯本。日人宇野哲人《支那哲學史講話》係仿效此書所成，而國人早期「中國哲學史」的寫作頗有宇野哲人之痕跡，因而文德爾班《哲學史教程》對中國哲學史的建構可說有間接的影響。圖為 Tübingen: Mohr, 1993 年第 18 版的版本。



日人松本文三郎（1865-1944）的《支那哲學史》，出版於明治 31 年（1899），是日本的第一部中國哲學通史。圖為早稻田大學出版社藏版，明治 40 年的版本。



宇野哲人 (1875-1972) 的《支那哲學史講話》(1914)，在回憶錄中宇野哲人自承受到文德爾班影響頗大，此書係採列傳體例。圖為東京：大同館，大正 13 年的版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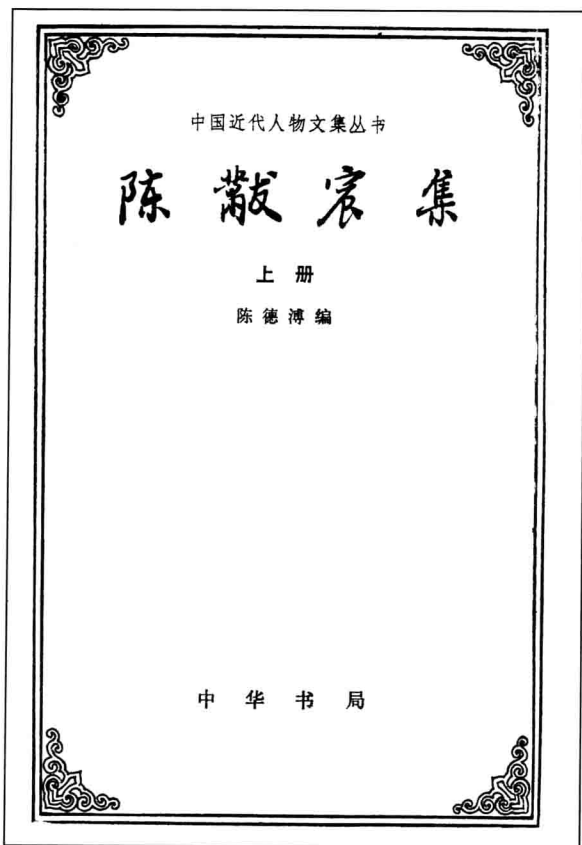
宇野哲人於昭和三年（1928）的《支那哲學史概論》，此書為《支那哲學史講話》的姊妹作，寫作方式係以問題的推移為中心。圖為東京：金の星社，昭和4年的版本。

謝无量編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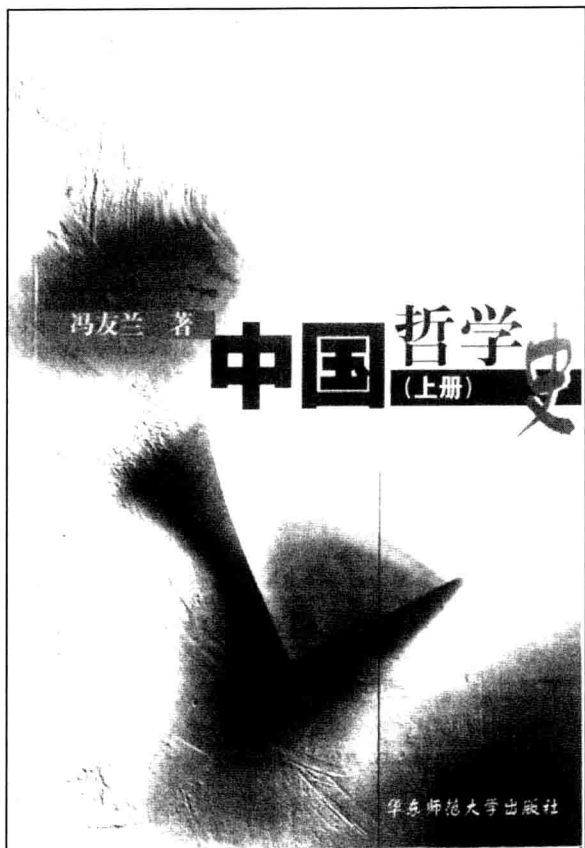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哲學史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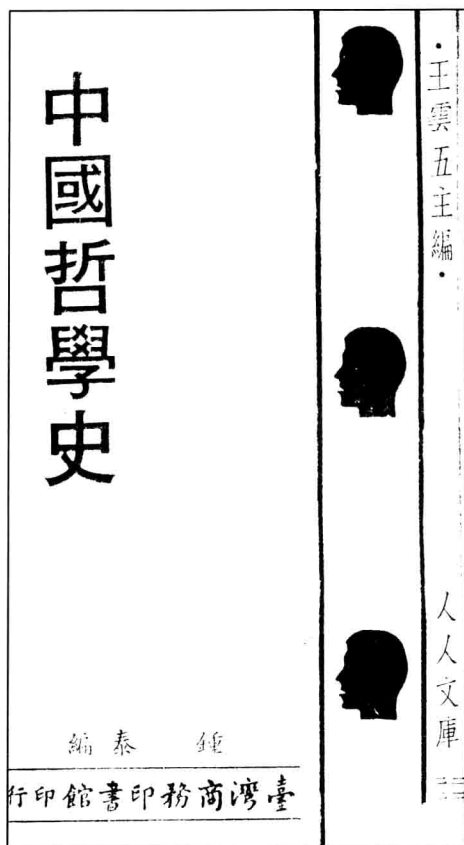
謝无量(1884-1964)於1916年的《中國哲學史》，可說是「中國哲學史」學術體裁的濫觴之作。但在胡適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問世之後，此書的地位及重要性便很快地被取而代之。圖為台北：台灣中華書局，1980年的版本。



陳黻宸（1859-1917）為北大哲學門講授中國哲學史課程的第一人，其《中國哲學史》（1916）始自伏羲、神農、顓頊、帝嚳、堯、舜等古史傳說的人物，終於文王、武王、太公，幾乎是經學式的講法，全然不涉及哲學的思辨；對於哲學史發展的涵蓋面亦十分不足，可說是一部欠缺哲學意識的哲學史。氏著《中國哲學史》收錄於《陳黻宸集》。圖為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的版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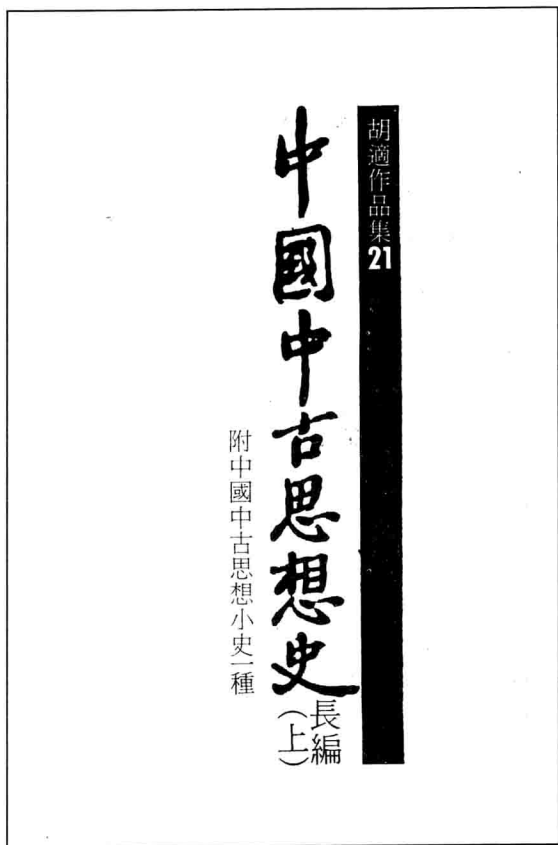
馮友蘭 (1895-1980) 的《中國哲學史》上冊於 1931 出版，修訂後的上下冊則於 1934 年出版，可說是第一部在新的學術規範下或具有近代意義的中國哲學通史。所謂近代意義指的是以哲學意識來省識中國傳統學術，並以西方哲學架構來論述中國哲學的發展，本書依循的是孟太葛 (W.P.Montague) 新實在論的觀點。圖為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0 年的版本。



鍾泰（1888-1979），早年留學日本，此書是其任教之江大學時所著，並於1929年出版。全書上起先秦、下至晚清，分為上古、中古、近古、近世四編，涵括110餘位哲學家，是早期的中國哲學史通史性著作。「上古、中古、近古」的分法可推及西方哲學史中的「古代、中世紀、近代」，而日人支那哲學史著作中也常見此種分法。圖為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8年的版本。



胡適的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(1919)，截斷眾流，直接從諸子講起，並且經、子各家一視同仁，哲學史因而有了不同於傳統經學史的風貌。蔡元培為胡適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作序時謂胡適「從此等一半神話手段、一半政史的記載中，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，編成系統。」馮友蘭亦認為此書「有掃除障礙、開闢道路的作用」，但由於全書實證主義色彩過於明顯，被金岳霖評曰「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。」圖為商務印書館 1947 年的版本。



在實證主義的影響之下，胡適認為哲學是假科學，最後傾向廢哲學，故而其 1930 年寫成的《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》便名為「思想史」而非「哲學史」。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由於只寫到先秦部分，後來改名為《中國上古哲學史》以配合其《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》。牟宗三批評曰「他以寫哲學史出道，結果反哲學，對哲學一點不入。」《中國中古思想史》部分內容曾經分開發行，直到 1970 年才以手稿影印方式完整成書。圖為台北：遠流出版社，1986 年的版本。

前言代序

中國哲學學科的建構，至今不過百年，但其間所遭遇之種種質疑，恐怕是中國現代學術建立過程中最為特別的一環。斯塔斯（Stace）《批評的希臘哲學史》曰：「固然埃及、中國、亞述（Assyria）等處也產出了偉大的文明，各有獨特的藝術和宗教，然而決不能說他們有哲學可言。¹」中國有哲學嗎？如果有，何以孔孟老莊乃至於程朱陸王所呈現的哲學會迥異於笛卡兒、斯賓諾沙、萊布尼茲、康德、黑格爾等西方哲學的風格？吾人基於何種標準而稱之以哲學？而中國哲學的特質又何在？如果沒有，中國哲學豈不如人哉？中國哲學又將如何自處？又該何以名之？除此之外，同樣的內容、材料、範圍，或謂之中國哲學史，或謂之中國思想史，或謂之中國學術史，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不同的稱謂是否也暗示了對「中國哲學」認知的差異？而三史之間，其區別又究竟如何？或謂曰：使用西方哲學理論或術語對傳統學術進行詮釋，才具備哲學性也才稱得上哲學史；就傳統學術自身理路及學派流變如實闡述者，則近乎學術史；學術史側重義理思想部分，則謂之思想史，這樣的區分果其然乎？果不其然乎？

中國哲學史的建構可說肇始於日人「支那哲學史」，而日人「支那哲學史」的構想亦是仿自西方哲學史。要直到胡適、馮友蘭的作品問世之後，中國自身才有了具備近代意義的哲學史作品。在哲學引進中國之初，國人對於「哲學」之名義多半未能究其實，加上透過翻譯之後，哲學語詞的本義更不易如實掌握。而這些哲學語詞的概念在傳佈、使用的過程逐漸定形，遂使得中國哲學呈現一種頗為

1 [英] 斯塔斯著、慶澤彭譯：《批評的希臘哲學史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5）頁 10。

弔詭的情形：它雖然也使用西方哲學某些語詞或觀念，如「形上學」（或譯為玄學、元學）、「本體論」、「宇宙論」，但對這些語詞的理解，卻又未必如實地扣緊著 metaphysics、ontology、cosmology 的原意；於是，看似雖有西方哲學之形，但實際上的理解卻又不盡然是那麼一回事，這不由得讓人聯想起《周禮·冬官考工記》的一句話：「橘踰淮而北為枳。」《晏子春秋·內篇·雜下》也載：「橘生淮南則為橘，生於淮北則為枳，葉徒相似，其實味不同。所以然者，水土異也。」莫非哲學亦有橘枳之辨？則哲學之分中西，豈亦水土使然哉？

哲學之分中西，當然不是僅僅水土問題便可以簡單帶過，這涉及知識轉型與歷史的發展湊泊。中國學術的近代化與知識轉型過程中，日人明治維新的成果可以說起了帶頭與示範的作用，早期無論是文學史或哲學史、思想史的作品，基本上都是模仿日人之作。而以近代方式整理中國傳統學術過程中，東京大學哲學科率先採用了「支那哲學」一詞，之後中國學者沿用此名而有「中國哲學」之謂。而日人所謂「支那哲學」主要由經學、子學、理學所構成，玄學與佛學並不列屬其間，可以說基本上是儒學為中心，這也奠定了之後中國哲學史亦以儒學為中心的基調。既然如此，則玄學與佛學被認可並加入中國哲學史的過程當然值得玩味探索。

然而，傳統學術在過去並不僅僅是一純粹客觀的知識，它涉及實踐致用，佛學「由宗出教」涉及修證自不待言，即便是儒學亦如曾國藩所言：「讀書之道，以胡氏之科條論之，則經義當分小學、理學、詞章、典禮四門；治事當分吏治、軍務、食貨、地理四門。²」讀書所學，要求能回歸、致用於生活世界，而不僅是抽離於經驗世界的抽象概念。即便是思辨性較強的宋代理學，也僅在《宋史》曾經單獨別立〈道學傳〉，元、明、清各代便回歸〈儒林傳〉。如果「即事顯理」代表傳統學術的基本立場，則其工具理性的傾向是至

2 曾國藩：《曾國藩公全集》（台北：漢苑出版社，1976）頁367。